

从晚清政局变动看文化自觉的重要性

熊月之

[摘要]晚清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远不同于传统中国。与传统的天下论、君主论、循环论正好相对,晚清时期万国论、宪政论、进化论影响广泛而深入。晚清时期三股重要政治力量中,清政府统治者、太平天国起义军均缺乏宏阔的世界眼光、敏锐的时代意识,在文化创新与文化自觉方面乏善可陈,所以最后都失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比较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意识,比较有文化创新意识,比较有文化自觉,所以最后取得了胜利。无论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还是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文化创新、文化自觉都是极其重要的。

[关键词]晚清;政局变动;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2)01-0039-06

回顾 100 年前辛亥革命那段波澜起伏的历史画面时,人们不禁要问:有那么长统治历史的清朝,有那么多训练有素的军队,有那么多聪明能干的官员,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顷刻覆灭?革命风潮来势之猛,清朝覆亡之速,既出乎统治者的想象,也出乎革命党的意料。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辛亥革命胜利来得之快,代价之小,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1](p.1)}

那么,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答案,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统治者在人民心目中早已完全失去威信,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也是清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但是,光有这些答案显然还不够,因为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 60 年,中国也发生过反对清朝统治的战争,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我们能说那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野蛮吗?能说那时的清朝政府不腐败无能吗?为什么那一次战争是以清朝政府胜利、太平军失败而告终?所以,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应当考虑更广阔的国际背景、更独特的时代特点、更深刻的文化因素,这也就是本文要讨论的文化自觉问题。

文化自觉,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概念,是

费孝通在 1997 年提出来的,这些年学术界有许多讨论与阐释、发展,现在已经写进了中央文件。费孝通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p.166)}

文化自觉作为学术概念,是这些年才有的,但是,文化自觉作为一种实践,是自近代以来就已有之,在晚清时期已经有所表现。

一、晚清时期“新三论”势如潮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相一致,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来,一浪高过一浪,影响极其广泛。在思想文化方面,对清朝统治冲击最大的话语,可以概括为新三论:一是万国论,或曰世界论;二是宪政论,包括民约论;三是进化论,或曰天演论。

先说万国论。

中国自秦汉以后,到近代以前,就国际环境而言,在东亚地区一直处于文化高地,其文明程度高于周边地区与国家,是文化出超国。中国以老大多自居,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亦以老大多尊之。那时中国人讨论问题,开口闭口“天下天下”,周边地区被视为蛮夷之地,被称为岛国、海国。

从更大的范围看,16世纪以前,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由于通信联系与交通工具的限制,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与澳洲等世界各大地区处于彼此隔离状态,联系时断时续,相互影响不大。那时世界各地的历史是相对独立的历史,各地区的文化也是相对独立的。其时,中国与欧洲虽然也有一些联系,但欧洲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欧洲文化对中国也没有很大影响。从1492年哥伦布登上美洲新大陆以后,欧洲势力逐渐向南北美洲、非洲、亚洲扩展,世界逐渐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这一时期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全球化早期阶段。中国尽管在明代已有郑和下西洋,明末清初也有数量可观的传教士来华,徐光启等人也在接引西学方面做过一些努力。但是,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没有遇到外来文化的严重挑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中西交通日趋便捷,中西联系日趋频繁,国人的视野日趋开阔。人们讨论问题,一变先前动辄“天下天下”的口气,改口为全球、五洲、万国。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以万国、全球、五洲为书名的书籍不知凡几,诸如《万国公法》、《万国历史》、《万国地理》、《万国药方》等,传教士所办的一份著名的刊物就叫《万国公报》。

天下与万国,有本质的不同。在万国话语下,中国只是列国之一,不是唯一。唯一是无可匹敌、无可比拟的,之一则是可以比较优劣、一论短长的。在万国话语下,中国的政治体制、行事方式,中国的文化,是不是正确、合理,要放到万国即全世界的范围里面去考察、比较。万国论出现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有一段名言,很能说明在万国并立的国际环境下变法的迫切性:“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

阂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再说宪政论。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后,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宪政等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四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鸦片战争以后,通过来华人员(包括传教士、商人与其他外国人)、外出人员(出使人员、商人、游历人员、留学生)、报纸杂志,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传进了中国。卢梭阐述社会契约论的《民约论》,在1898年上海就有中文译本《民约通义》出版,以后又出版了《路索民约论》等多种译本;孟德斯鸠阐述三权分立原则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在1902年就有《万法精理》译本问世,以后又有严复翻译的《法意》出版;阐述自由主义原理的经典著作,约翰·密勒的《自由论》,在1903年就有名为《自由原理》的译本出版,后来又有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出版。至于体现这些思想观念的论述,在1900年至1911年的形形色色报纸杂志中,可以说是满坑满谷,铺天盖地。这些思想观念猛烈地、持续地、深刻地冲击着传统的专制主义,引发人们的焦虑、思考,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正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所表达的那种感情:“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3](p.40)}

在宪政论的影响下,人们将国家的强弱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宪政使得国家富强,专制、独裁使得国家贫弱。早在1884年,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病逝之前,口授一份《遗摺》,提出在国势危急之际,最根本的救国之道,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夫西

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软?”^①

甲午战争以前,曾经随使英国的宋育仁论证议院与国家富强的内在联系时说:“政非议不成,议非众不公,而民众不能按户而说,执途而语,故由民举其能者贤者,代民达隐,陈其所利,除其所害,故议院为欧洲近二百年振兴根本。自有议院,而君不能黷武、暴敛、逞刑、抑人才、进佞幸,官不能怙权固位、枉法营私、病民蠹国,故风行景从,不崇朝而遍欧美。议院为其国政之所在,即其国国本之所在,实其国人才之所在。”^②

同一时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说得更为直接:“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③

类似看法,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里比比皆是。在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是小国,俄国是大国,日本是立宪国,俄国是专制国,战争的结局日胜俄败,这更为宪政强国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5年中国要求立宪的呼声陡然高涨。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端方等均吁请朝廷考虑立宪问题。迫于舆论压力,慈禧太后在这年8月派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考察的实质,就是进行不同政体的比较,看看宪政是否真的高于专制。考察的结论一边倒。端方等人说得最透彻:以中国与欧洲比,中国贫弱,欧洲富强,但欧洲各国,土地不如中国大,甚至小于中国数十倍,人民不如中国多,甚至少于中国数十倍,但其兵力

之强、国家之富有超过中国数十乃至数百倍者,这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在于:“乃知其所以富强者,不当于其外交之敏捷求之,而当于其内政之整理观之。夫世固未有政治不修而其国能富、其兵能强者;亦未有内政不修而外交能制胜利者。欲判其内政之能修与不能修,此不必问他,但问其政体之为何而可以判之矣。”欧洲各国所以富强,就在于其实行立宪政体,中国之所以贫弱,就在于中国仍用专制政体。当此霸权主义时代,中国若想富强,“除采用立宪政体外,盖无他术矣”。^④

再说进化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变易论、循环论,没有进化之说。《三国演义》开头那段,“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就是循环论。历代王朝由建立—兴盛—衰落—灭亡,遵循的也是循环论,即黄炎培与毛泽东谈话时说到的周期率。达尔文进化论面世以后,物质世界本来没有联系的东西,被一条进化链条连接了起来,所谓高级动物是由低级动物进化来的,人是由猿猴进化来的。这套理论被运用到政治学领域,本来各自独立存在的不同政体之间、不同政治观念之间,也被一条进化链条连接起来。在这套话语体系下,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不但有性质的不同,而且有程度的高低,品质的优劣。

早在1855年即《物种起源》出版4年前,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就在上海提出民族、种族、国家莫不“弱屈于强”这一类似达尔文主义的法则。^⑤1873年,江南制造局出版了英国雷侠儿原著,玛高温、华蘅芳翻译的《地学浅释》,该书述及变化与进化的知识。书中指出,地质是渐变的,地壳岩石记录了亿万年的历史,地球表面的特征是在漫长时间里自然形成的,生物从产生到现在经历着连续性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引起了生物形体的变化,生物本来就具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同生物固有的适应性相互作用而

①张树声:《遗摺》,《张靖达公奏议》卷八,光绪己亥刻本。

②宋育仁:《采凤记》,光绪乙未冬月袖海山房石印本,第11页。

③端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端忠敏公奏稿》卷六。

④普西:《达尔文与中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参见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历史地形成的。^①书中谈到了拉马克与达尔文的生平与学说。1873年,《申报》载文《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介绍达尔文《人类原始》一书。1876年,《格致汇编》载《格致略论》,述及地质演化与生物进化论。1877年,《格致汇编》载傅兰雅所写《混沌说》,介绍生物从简到繁的进化过程,谈到人猿同祖论。到19世纪80年代,进化论已成为一些书院讨论的内容。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学生钟天纬就在所写课艺中,准确地介绍了达尔文的生平及生物进化论。^②甲午战争以后,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更将进化论的介绍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介绍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的译作、论文成批出现。1902年,马君武发表《新派生物学家小传》,介绍《物种起源》发表以前与进化论有关的生物学家生平。随后,马君武将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有关内容译为中文,分别以《达尔文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为名出版。1903年,李郁翻译了《达尔文自传》,另加《达尔文生前之生物学》和《天演论》两章,合为一书出版,名《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传》。同年,《新民丛报》刊载《进化论大略》一文。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传了进来,日本思想家加藤弘之的《物竞论》、斯宾塞的《原政》、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为其代表。到了辛亥前几年,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成为关心西学的知识分子的必备常识。

以上这三论,万国论将世界五洲联系起来,为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提供了空间依据,宪政论否定了专制论,进化论将不同的政体联成一个阶梯。“新三论”结合在一起,相互支撑,形成了话语强势,将“老三论”,即天下论、专制论、循环论冲荡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晚清时才在中国出现的报纸杂志,则为这些话语的传播提供了媒介,使之如虎添翼。于是,这些话语与公正、天赋、天然、天道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天下公理论、天赋人权论、天演公例论、世界潮流论。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套话语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论。例如,梁启超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邹容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孙中山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二、清朝亡于没有文化自觉

在今人看来,所谓公理是不是都“公”,放之四海而皆准?所谓人权是不是“天赋”的?将生物进化论引进人类社会是不是合适?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有了极其丰富的成果。以所谓共和高于君主而论,也不是世所公认的公理。1792年法国人在大革命后推翻了帝制,成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实行共和制。12年之后,即1804年,拿破仑就恢复帝制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结果赞成者超过350万人,反对者仅2500人,法兰西共和国又被改为法兰西帝国。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法国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共和高于帝制。面对“新三论”这股话语强势,清朝统治者既对世界大势不甚明了,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又对革命派的宣传攻势应对无方。经朝廷首肯的张之洞的《劝学篇》,算是抗拒西方民主论中最有系统、最有影响的读物了,但在为何要坚持君主专制,为何要坚持儒家的纲常名教方面,此书并没有提供什么富有时代气息的新颖内容。至于新式媒体,在洋务运动时期,尽管那时香港已有《循环日报》,上海租界已有《申报》,但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领袖,都对新式媒体报刊重视不够,左宗棠甚至不屑一顾,斥新式报人为江浙无赖。戊戌变法时期,虽然有些官员看到了报刊的重要性,清朝政府也曾做过官办报刊的努力,但成效不大。清末新政时期,清朝政府在自办报刊方面虽然比先前重视,至少办过一百多种官报,包括中央部门办的《政治官报》、《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地方政府办的《北洋官报》、《南洋官报》、《湖北官报》等,但这些报纸,或所办非人,经营不善,或理念陈腐,令人生厌,在理论创新、宣传气势上,都乏善可陈。《政治官报》历时4年,无法收回报费就有银元9万元。四川20余县的一次调查显示,“每遇旅舍主人,问取官报,多不知为何物”。《山

^①参见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②钟天纬答卷,《格致书院课艺》第4册,光绪己丑年,张园选印。

东官报》除了官派外,竟无一人购阅。^①

在理论上,面对革命派日复一日宣传的万国公理、天演公例、天赋人权,清朝统治者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三纲五常的老调子,提不出任何可以与那些宣传相抗衡的新的话语。1901年1月29日,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革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弦”。那么,三纲五常为什么就“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不可变易呢?清朝统治者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论证。其后,张之洞、张百熙等在癸卯学制的章程中,重申三纲五常不能变,写有这么一段话:“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浅深,并非强归一致。极之由小学改业者,亦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5](p.83)]这段话算是清朝统治者对于为何要坚持三纲五常所论述最为详细的了,但仍然没有对其合理性给出充分的、有说服力的阐释。

三、革命党人较有文化自觉

与清朝统治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有相当广阔的世界眼光,有相当丰富的西方文化素养,对所持理论有比较充分的阐释,对新式媒体相当重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牢牢地掌握着舆论宣传的主动权与进攻性。他们在海内外有几十份革命刊物,单在上海就有《苏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10多种。在香港,孙中山在1900年就创办了《中国日报》。

孙中山不但重视办报,自己还亲自撰文,阐释三民主义理论。他在《民报》等中文刊物上

发表《〈民报〉发刊词》、《军政府宣言》等向国内人民宣传革命主张的文字,还注意向欧美国家宣传自己的主张。1904年,他以英文撰写《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解释反清革命的道理,列举清朝政府的罪恶,包括:(一)清朝统治者的行政措施,都是为了他们的私利,并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二)统治者阻碍人民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三)将汉族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不给汉族平等的权利与特权。(四)侵犯汉人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五)他们从事于、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与行贿。(六)压制言论自由。(七)禁止结社自由。(八)未经人民同意而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九)在审讯被指控为犯罪之人时,他们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十)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人民的各种权利。(十一)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6](p.65)]孙中山很有世界眼光,他列举的清朝政府的这些罪恶,都是从西方人普遍认可的自由、平等、义务、权利等理念出发的,以期获得西方世界对反清革命的理解与同情。

与此同时,孙中山又从坚实的历史出发,说明中国是文明、开放、爱好和平的民族:“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西安府的景教碑提供我们一个绝妙的记录,说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所进行的传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个新宗教,此后它便日渐繁盛,现在已成为中国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种。不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许可在帝国内部自由地纵横游历。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6](pp.63-64)]

针对西方世界甚嚣一时的所谓“黄祸”论,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和平品格:“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

^①《官报停办之原因》,《大公报》,1908年9月25日,第二张。

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6](p.67)]

以清朝政府与革命党人两者相比,清朝政府在枪杆子方面,并不输给革命党人,但在笔杆子方面,则完全不是革命党人的对手。所以,清朝之亡,实质是亡于文化,亡于文化方面没有自觉,缺少创新。

四、太平天国也缺乏文化自觉

与辛亥革命可以作一比较的是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相比:一是没有组织起一个如同中国同盟会那样的革命政党,尽管同盟会也比较松散,但毕竟是一个有目标、有纲领、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太平天国则连这样的政党也没有。二是没有构建出像三民主义那样一整套能够打动人心的革命纲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天父天兄那一套,在义理上很难征服人心。一个革命纲领能否将成千上万的群众吸引过来、动员起来,关键是这一纲领是否具有广博的覆盖面、丰富的内涵性及动人的说服力。由民族、民主、民生构成的三民主义,就是具有广博的覆盖面、丰富的内涵性及动人的说服力的革命纲领,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认可同性,理论有很大解释空间的、能够高度自治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相当远见的纲领。太平天国也排满,但是没有将排满发展为民族主义,没能与那时欧洲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相呼应。太平天国制订了《天朝田亩制度》,但这仅仅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将其作为纲领真的贯彻执行,更没有将其发展为民生主义,无法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太平天国批判孔子,但仅仅是从偶像批判角度进行批判,并没有将孔子与专制主义挂起钩来,当然更没有从批判孔子发展为民主主义。三是没有一群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那样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领导人。洪秀全定都天京以后,躲进深宫,追求享

乐,全不把政事放在心上,实质上就是一个皇帝,一个不那么能干的开国皇帝。四是太平天国在文化上很不成功。十多年中,太平天国毁掉了难计其数的经史子集,在除旧方面不可谓不尽力,但在布新方面乏善可陈,总共出版过45种出版物,影响相当有限。尽管洪仁玕知道新闻纸的价值,尽管香港在1854年已有《遐迩贯珍》,上海在1857年已有《六合丛谈》,在1861年已有《上海新报》,但太平天国没有办过一份报纸杂志。这种对待文化建设和理论宣传的态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完全不能相比。所以,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的差别,孙中山与洪秀全的差别,是具有世界眼光与没有世界眼光的差别,是具有现代意识与没有现代意识的差别,是有文化创新与没有文化创新的差别,是前近代与近代两个时代的差别。

晚清三股政治力量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比较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意识,比较有文化创新意识,比较有文化自觉,所以胜利了。清朝政府统治者、太平天国起义军都缺乏宏大的世界眼光与敏锐的时代意识,所以,在文化创新、文化自觉方面均乏善可陈,都以失败而告终。由此可见,无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对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而言,文化创新、文化自觉都是极其重要的。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A].费孝通文集(第14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3]邹容.革命军[A].邹容文集[C].重庆:重庆地方史资料室,1982.
- [4]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A].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5]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A].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6]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A].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寒江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increase the social consensus.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justice, lawfully administration, public management and people-oriented, to construct the new pattern of society management that the Party committee leading,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social cooper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ddition to these measures, we also should improve the social management mechanism,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of social management;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mechanism, expedite the public opinion feedback channel; innovate the social service's system, build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purchasing the public service; innovate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adhere to the mass line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e the means of social management, build evaluation system of social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social management.(REN Ying-hong)

On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 in Late-Qing Dynasty: The world environment of Late-Qing Dynasty is far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hina. In opposite to the traditional world theory, the impact of the new theory of the Late-Qing Dynasty exerted widely and deepl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are three strands of important political power, the Qing government rulers an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r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insurgents world view and a keen times consciousness, also in the aspects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o finally failed. With Sun Yat-se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has been a world view and time awareness, more cultur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mor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o finally came the victory. Whether for a nation, a country or a political party, or for a regime is concerned,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XIONG Yue-zhi)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ic Thoughts of the Party's First Generation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with Mao Zedong as the core of the Party's first generation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creatively combined Marxis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reality of China, and has formed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ic thoughts: establishe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combination of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Puts forward "stepping to science," "develop the key aspects and catch up with others" surpassing strate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ocating combining learning foreign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Bring up a "enough, outstan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rts" team.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ese nation come in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not only establish a relatively complet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from scratch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gradually,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ides a strong technology support to social progress and people's health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but also has made the world prominent achievements in some important fields, achieved the expected goal, which are the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OUYANG Xue-mei)

A Rustic Opinion on the Strategy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Finance in China

The low level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ial results from not only the financial supply, but also from the lack of rural financial demand. The further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need to reform the existing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add a new type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attract lar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rease of agriculture to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financial credit supply, also need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to improve financial needs of agriculture, farmers and the rural, in order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rural finance balanced development.(YIN Chen YAN Li-xin)

An Attempt of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that Shouldn't have Lost—in Memory of the 55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a Philosophy History Symposium in January 1957: In January 1957,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held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symposium, it is not only the business of Beijing Universi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try, it is a big event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 great event of ideology and of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e experience is worth summarizing to learn wisdom, better promoting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o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ZHAO Xiu-yi)

Mao Zedong and Several Theoretical Problems on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he theme and the task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of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 with China's concrete practice are to realiz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marked the comple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began, also is 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Mao Zedong is the founder and practitioners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ists of the revolution of social system and the